

引 言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加阅读而引用托克维尔甚至比他们同样对待《圣经》和莎士比亚尤甚。

——罗素·贝克尔

英国左翼史家 E·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称 20 世纪为“极端的世纪”因为正如著名音乐家梅纽因所言“这个世纪不仅”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幻想”。在这百年之中，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层出不穷，政治实践也风起云涌，而欧洲是首当其冲的花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一战、紧接着二战，以及随后东西方之间的僵硬对峙，残酷地粉碎了 19 世纪以来的盲目乐观主义。极权主义（在包括哈耶克 F. A. Hayek、阿伦特 Hannah Arendt 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共产主义的苏联与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不过是一丘之貉）的肆虐尤其让西方世界既震惊又困惑。于是，求助于前人的经典著作自然地成为纾难解困的出路之一。可以说，正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以来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中，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 19 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力克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相对于左派的普遍失势，西方世界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复兴更是把托克维尔的声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冷战结束以后仍然持续不衰。

今天，解读托克维尔的著作不仅有助于了解 19 世纪的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实践；而且有助于从理论的高度理解民主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并对民主的危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还可以一窥当时仍处于强势地位的欧洲对美国小兄弟的不言而喻的优越感和隐隐约约的戒备心理。另外，解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对于我们了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之外、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之前的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国内已非常熟悉）也有助益。这也是本书的出发点。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西方学界对托克维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 托克维尔研究的资料整理和出版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一些知名学者的主持下 托克维尔的文集现已整理出版多达几十卷 其次 涌现了大批卓有建树的学者以及大量优秀的专著和论文。另外 跨越大西洋两岸的托克维尔协会（*La Societe Tocqueville*）的成立以及以英法两种语言出版的《托克维尔评论》（*La Revue Tocqueville*）的创刊，更是标志着托克维尔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托克维尔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商务印书馆在 1988 年、1992 年和 2004 年出版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董果良译）《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冯棠译）以及《回忆录》（*Souvenirs*，董果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又推出了周炽湛、曾晓阳译本），对托克维尔研究也愈益深入。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民主、革命、平等、自由、暴政、宗教、民情、司法、社团等广泛命题 而且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领域。但总体上中国对托克维尔的研究还很不够，目前还没有全面探讨托克维尔的专著。因此，系统介绍托克维尔的思想甚有必要。

作者认为 对于学者们而言 托克维尔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重大

该协会于 1977 年由西奥多·卡普娄（Theodore Caplow）倡议成立。历任主席分别为卡普娄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1977 年起）普力克斯·托克维尔（Prix Tocqueville）（1980 年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92 年起）和奥利维耶·让日（Olivier Zunz）（2000 年起）。

贡献：一是提供了 18 世纪及更早的法国和 19 世纪法国及美国的宝贵资料，二是提出了一些至今仍有说服力的洞见，三是贡献了一些讨论的主题。深入探讨这当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将是极富挑战性的，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全面了解托克维尔其人其作。作者试图以时间为经、著作作为纬，尽可能全面地介绍托克维尔的思想以及西方对托克维尔的研究，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评论，以求抛砖引玉。毕竟我们的目的不是充当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是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摒除已被证实的谬误。另外，与法国学者更多地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学者更多地关注《论美国的民主》不同，作为非当事国的学者，我们既可以尽量采取一种相对比较超脱的态度，尝试提供一种“第三方”观点；也可以试着从整体上对托克维尔的著作展开全面的解释。

前人曾警告：“阅读托克维尔的书……不光需要眼睛，还需要思考。它不是消遣，它是工作。”^①事实上，托克维尔生前评论后人对孟德斯鸠的态度的一段话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许多人在引用中对孟德斯鸠赞不绝口，但很少有人认真地读他。我甚至敢说在严肃的人士当中也是如此。他的大多数观点如此宽泛，读者几乎总能找到几个显得错误的特例，并因而弃之不顾。读者必须把自己提高到与作者几乎不相上下的高度，视野必须如同作者一样开阔，才能认识到被许多特例证明为伪的观点，就其普遍意义而言却是极度深刻的公理。”^②基于此，作者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慎重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并试图真正理解托克维尔。另外，在“注经”这件事上，布鲁姆（Allan Bloom）的警告也足以让人保持必要的谦恭和清醒。毕

罗西（Pellegrino Rossi）语，cited from Françoise Me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Charlottesville &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70.

致弗勒斯隆（Freslon），1855 年 12 月 29 日。Françoise Me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Charlottesville &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100, n. 69.

“‘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上，偷偷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的幻觉。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者的亲密关系……我想，巨人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参阅布鲁姆著 秦露等译：《巨人与侏儒》[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竟 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汲取灵感或教训 但人为地叠加不属于托克维尔的看法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是危险的。

一般而言，在对政治著作的阐释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理解文本的含义首先是破译作者的含义或重新阐释作者用语言表达过的本意，原著阐释者的任务是确定“它的作者在他的时代为他的读者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想表达些什么”，搞清楚作者本人复杂的意愿^①，阐释者要尽可能摆脱自己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和制约。以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阐释主要是理解作品本身而不是理解作者，“理解主要是对所说出内容的理解 其次才是分离并理解作者的意思”。阐释的对象应该是作者所说出的东西 已经固定在文本中的东西 因为“作品的含义不是偶然地 而是永远地超出了它的作者”。他们主张在阐释上的开放性的观点。“一部作品的真正含义在向阐释者披露时 特别取决于阐释者的历史环境 因而也取决于整个历史的客观进程”^②。理解永远是一种阐释 而阐释是理解的公开形式 “由于阐释的角度寓于历史传统的运动之中 终极的或“正确的”阐释并不存在。

具体在对托克维尔的阐释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罗杰·博伊西 (Roger Boesch) 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方法 (与斯金纳近) 它强调阐释时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要更好地理解托克维尔，我们必须把自己沉浸到他那个世纪。我们必须意识到托克维尔是在我们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形成之前写作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当代透镜去观照托克维尔的著作将严重地歪曲他的思想。”另一种是以惠特尼·波普 (Whitney Pope) 为代表的系统化的方法 (与伽达默尔近) 它试图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离析出独立于时代背景的一

① 其主要代表作为《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该书已由奚瑞森、亚方翻译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出版。

② J·G·冈内尔著 王小山译：《政治理论 传统与阐释》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01 页。

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该书已有中译本。

④ J·G·冈内尔著 王小山译：《政治理论 传统与阐释》第 116 页。

系列普遍原则 认为“托克维尔的理论无论是对贵族或民主社会 还是对平等程度不同的民主社会 或者前工业、工业、后工业社会都是同等适用的。”显然 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 比较合理的方法是互相结合 既看到托克维尔思想中超出时代和环境限制的合理成分 也注意甄别时代和环境对托克维尔思想的局限。^① 这也将是作者尝试运用的方法。

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民主正张满帆前进”的时代。与同时代的愤世嫉俗者和随波逐流者不同 面对民主的潮流 托克维尔既没有表示鲁莽的乐观也没有陷入轻率的绝望，而是以冷静的态度细致分析民主的利与弊，期望从中发现一条可行的道路。他毕生在实践上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左冲右突 在价值上为自由殚精竭虑 调和民主（平等）与自由是贯穿其政治生涯和著述的唯一主线。为了在不可逆转的平等潮流下确保自由 托克维尔远渡重洋到美国考察民主 而法国建立自由民主的一波三折，又促使他把目光转向革命。他不仅试图做一名气象预告员（虽不能阻挡即将袭来的风暴 却可以提醒人们早做准备），^②更试图做一名领航员。

在托克维尔大量的著作、手稿、书信中 最为重要的是分别发表于1835年和1840年的两部《论美国的民主》、1851年完成1893年出版的《回忆录》以及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主要探讨了以美国为典型的无阶级社会的完美的民主，它预示着欧洲的未来；1840年的《论美国的民主》主要探讨了诞生于革命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不完美的民主 而该书的最后部分对民主的暴政的忧虑在后来的《回忆录》、《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成了讨论的主题。为此 本书分六章 第一章将简要介绍托克维尔的生平及时代背景 第二、三章将主要探讨他的第一个主题“美国”民主”阐释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

^① See Chad Alan Goldberg, “Social Citizenship and a Reconstructed Tocquevil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6, No. 2 (Apr., 2001), pp. 289 - 315.

^② George Wilson Pierson, *Tocqueville i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48.

分析他的美国民主观及民主理论 第四、五章将主要探讨他的第二个主题“法国大革命”阐释他的《回忆录》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法国民主的现实并追溯它的源头；第六章将主要介绍托克维尔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托克维尔思想的源流。

总之，本书试图通过对托克维尔其人其作的评述，来耙梳法国和美国在自由民主历程中的困惑、得失及教训。19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分别从正反两面证明：民主时代的中心课题是在迈向平等的同时保全自由，否则民主也面临坠入专制的风险，唯一的化解之道是自由——作为个人和作为公民的自由。不过，除了最为核心的材料以外，作者并未能全面占有研究托克维尔所需的所有资料；同时，虽然作者极力想要保持不偏不倚，但未必能够一以贯之；另外由于力所不逮，立论不周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努力中予以弥补。

第一章 无所适从的法国贵族

自由，那带着巨人声音的夜莺，惊醒了大多数沉睡者……除了为争取或反对自由而战，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些不可能热爱人类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专制君主。但是，一般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伯尔纳

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于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名门望族，他是属于缪塞（A. Musset）一代的贵族青年。是在伟大战役过后出生的迟到者，一个自感生不逢时的苦闷的“世纪儿”。作为一个支持民主的贵族，他既留恋旧制度也试图认同民主时代。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贵族价值在崩塌，法国人对平等的热情是不可遏止的，倒拨时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从贵族遗产中挖掘并保存合理成分（如美德和义务感）^①。深具忧患意识的他并不满足于充当书斋里的沉思默想者，面对民主的挑战，托克维尔尝试对之做出回答。

约翰·格雷（John Gray）等学者认为，现代以来的自由派运动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环境的起源，其历史独特性与特定的古典美德具有潜在的关联。“liberal”一词的涵义实际上是“liberality”（胸襟宽厚）的某种衍生。这种衍生实际上和古典共和主义对于勇气、节制和审慎的强调构成了某种同构的关系，并为宽容原则、尊重平等现代自由的内容奠定了个体伦理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托克维尔正是属于这一试图承上启下的思想家阵营。参阅舒炜《两种自由概念》与《竞技的公民自由观》。载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消解自由有什么错》[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基于出生、本能和个性 托克维尔属于贵族 然而，一种强烈而不可遏制的无私的理想主义意外地战胜了他对本阶级的狭隘忠诚，他意识到比服务于本阶级更崇高的义务，并积极献身于其同胞的幸福。夹在一个不得不摒弃的过去和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前途未卜的未来之间，托克维尔左右为难。而且，他的民主取向既未得到本阶级的好感 他的贵族出身 偏好 也使他难以博得其他阶级的拥戴。不过 不甘随波逐流的执着也使他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民主的幽微。即使他没能如愿以偿地在政治上获得辉煌业绩，但在思想史上他还是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当然，托克维尔的苦乐与成败既有家庭和个人的原因，也是时代使然。要了解其思想，我们还得求助于他的成长历程和他所生活的时代。

一、一个贵族的教育

托克维尔曾表示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①这番断言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但作为托克维尔自我写照却很恰当。对托克维尔而言，他对世界最初的认识首先来自家庭 因为家庭和交往决定了什么能看、能听、能读、能体验以及什么可以允许去看、去听、去读、去了解。对他而言 这意味着对荣耀的本能的执着追求和对群众 mob 乌合之众 的本能厌恶。

托克维尔的父系属于一个名为克勒里尔（Clerels）古老的诺曼贵族家族，其先祖可追溯到 12 世纪——曾参加了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黑斯廷斯的著名战役，这个家族于 1661 年开始用托克维尔来称呼其在诺曼底获得的领地。他们属于法兰西

西部的地方领主，与宫廷联系不深。到 18 世纪 通过联姻 家族地位有所提升。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维（Herve de Tocqueville 与著名的马尔泽尔布 G-C. L. de Malesherbes, 1721-1794 的外孙女路易丝（Louise Le Peletier de Rosanbo）的婚姻大大提升了他对政治的兴趣。相比之下 托克维尔的母系属于一个更为显赫的家族 这个罗桑博家族 Rosanbo）与宫廷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涌现了诸如马尔泽尔布、夏多布里昂（F. R. de Chateaubriand）等曾经在法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对近代法国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为托克维尔树立了榜样，又对他确定自己的人生观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童年的托克维尔身体孱弱 讨人喜爱 过着与世隔绝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处于相对封闭的家庭小环境里。父母和家庭教师勒苏尔神父（abbe Lesuer 给予了托克维尔最初的政治影响。托克维尔的家庭属于正统保皇派 对波旁王朝忠心耿耿 并因为可想而知的原因与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保持着距离。不过，他们并没有沾染没落贵族的骄横、残暴和堕落习气 遵循着贵族的道德原则 对仰赖自己为生的农民也宽厚以待。

托克维尔的父亲 作为正统保皇主义者 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政治保持着距离。虽然在 1804 年的时候他勉强接受了维尔内依市市长之职，但对正统王朝的忠诚使他无论是对这个职位还是对第一帝国都没有真正的热情，他以旧贵族作风淡然地对待他的职位。^② 1814 年 4 月拿破仑的倒台重新燃起了他对政治的渴

托克维尔的这位姨父在文坛和政坛都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阿达拉》、《基督教的真谛》以及《殉道者》等等 另有《墓外回忆录》传世。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流亡美洲 其“何必仅仅流亡出法国呢 我流亡出世界。”的言论折射忠于正统王朝、反对革命的态度。曾参加孔代亲王组织的反对革命的流亡军，与拿破仑始而短暂地合作，后终于决裂。在百日复辟之后 撰写了被路易十八宣称“比十万士兵还有用”的小册子《波拿巴和波旁王室》，曾在波旁复辟王朝担任要职。

事实上，失势的旧贵族对拿破仑第一帝国以及靠军功而跻身拿破仑宫廷的所谓新贵普遍极度反感。福斯伯爵夫人在 1807 年就充满怨恨地表示：“这伙人（新贵族）把咱们践踏到入地三尺了。转引自乔治·勒费弗尔著：《拿破仑时代》（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第 259 页。

望。当年6月18日他被任命为曼恩—卢瓦尔郡(首府昂热)郡守。此后他历任瓦兹郡(首府博韦)、科多尔郡(首府第戎)、摩泽尔郡(首府梅斯)、索姆郡(首府亚眠)以及塞纳—瓦兹郡(首府凡尔赛)郡守。由于深厚的家世背景和广泛的政治联系,他是1814—1815年间被任命的极端保皇主义郡守中唯一未被撤换的一个。1820年他被路易十八册封为伯爵。1827年他更被接纳进贵族院,得以出入于宫廷,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不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使他丧失了贵族身份及在凡尔赛的官位。此后他远离了政治,并有著作问世。父亲给了托克维尔以深刻影响——虽然后来托克维尔抛弃了保守的保皇主义观点,但从父亲身上他继承了基本的生活观念——献身国家和社会的热情,以及对精神生活的钟爱。

托克维尔的母亲比父亲在宗教和政治上更不妥协。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视大革命为上帝对法国的惩罚,同时她也是名坚决的正统保皇派,她认为路易·菲利普篡夺了波旁家族的王位,而对七月王朝充满了无法化解的敌意,对波旁王朝则充满了难以泯灭的怀念。多年以后,托克维尔如此回忆了发生在他三岁时的陈年往事:“我记得某个晚上,在当时我父亲住的大房子里,许多亲戚聚在一起。有着一副明亮、甜美的嗓音的母亲开始歌唱——那是一首在我国政治动荡时期著名的讲述路易十六不幸和他的死亡的歌曲。当她停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哭泣,不是为所有人都曾遭受的个人磨难,甚至也不是为在内战中和在断头台上失去的许多亲人,而是为那个十五年前丢掉性命,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从未见过的人的命运而洒泪——这个人曾经是法国的国王。”^②

不过,勒苏尔神父才是童年的托克维尔的主要教育者。这位神

^① 包括1847年出版的《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哲学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du regne de Louis XV*)、《路易十四统治概览》(*Coup d'oeil sur le regne de Louis XIV*)以及未曾出版的《回忆录》(*Memoires*)等等。

致刘易丝小姐(Lady Thereza Lewis),1857年5月6日。这首歌曲名叫《贝亚恩的游吟歌手》,歌词大意是一个贝亚恩的游吟歌手,泪眼汪汪,对他的山间老乡,把警报反复吟唱,路易亨利之子,在巴黎被下到牢房。这首歌可追溯到路易十六被捕之时。Andre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Inc., 1988, pp. 38-39.

父来自皮卡迪，也是托克维尔父亲埃尔维的老师，在政治上强烈地仇视自由主义者。在 1822 年 9 月 13 日 他写道：“整个欧洲受到这个被诅咒的自由主义者之流的骚扰……必须采取措施来制止它的传播。在西伯利亚的冰封的海上应该设立麻风病院，以便把瘟疫的传播者关起来；在那儿，他们将不会被隔离几天而是几年。我确信他们当中将没有一个能够回来。他们将彼此下毒、互相残杀、相互撕咬……在午夜，我将把他们放上汽轮迅速带到勒哈弗尔。在那儿，一艘轮船等着把他们带往目的地。如果来一场及时的风暴，行程将会缩短……鲨鱼 据说喜欢腐肉 将饱餐一顿 而这些可怜虫也就不复存在……”^①对体质孱弱的托克维尔，勒苏尔神父给予了几乎是溺爱的宽容和极高的期望，他是托克维尔的启蒙老师和严格的冉森教派（Jansenists）^② 倾向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的灌输者。托克维尔也回报了神父的宠爱。

不过，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在精神上对托克维尔的影响也许超

^① Andre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Inc., 1988, p. 43.

^② 17 世纪由荷兰人科勒留斯·冉森（Cornelius Jansen）创立的期望对天主教进行改革的新教教派之一。这个教派保持着天主教的色彩 但在坚持“神宠论”“先定论”和道德世界中，“仁慈”与“贪欲”势不两立的二元对抗等问题上又深得加尔文教派的要旨。冉森派理论具有显著的民主性特点：它认为教会应当是信徒的议会，所有的信徒，都有权参与教会的管理，而且这种教会本身已经掌握了圣彼得的全部，它只是把精神的权威赋予基督教会的最高统治集团，后者只能作为信徒的代理人有节制地行使它的权力。此外，它还提出了“一致性”的原则，认为任何教会所做出的决定，只有在取得全体教民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方能生效。该教派在 17 世纪与耶稣会进行的神学论争中失败，影响削弱。不过 冉森派与以巴黎高等法院为核心的法官们“冉森党”结成联盟 在法国的反专制和立宪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冉森派的理论对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产生了重大影响。

托克维尔在波士顿获悉神父的噩耗时，极度的哀伤使他在致其兄爱德华的信中写道：“一个人应该预先使自己在思想上做好与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的分离的准备，我的朋友，这样说是徒劳的。不，我不能使自己习惯于眼睁睁看着童年时代的支柱、朋友而且是那样的一生的朋友突然之间消失不见。我希望我最终能使自己从这一可怕的不幸中挺过来 但在灵魂的深处 保留着一个因其真实而让人痛心的想法 无论是时间还是友谊 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未来，再也带不回世界上极少的人才能发现的东西，再也带不回一个其每一个想法、每一点都只为我们的人，我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过任何类似的奉献……”
George Wilson Pierson, *Tocqueville i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52.

过了他的父母和勒苏尔神父。马尔泽尔布既是波旁王朝的重臣，又是开明改革家、启蒙哲学家的著名保护人和出版自由的鼓吹者、植物学家、让·雅克·卢梭的通信人。1752年路易十五的行政法院通过议案禁止百科全书出版并命令警察查没书稿时正是时任新闻出版总监的马尔泽尔布及时告知狄德罗并把《百科全书》的全部手稿藏匿在自己家中，从而挫败了没收计划。作为旧政权的权臣以及1792—1793年路易十六审判期间勇敢的辩护人，^①雅各宾恐怖期间，马尔泽尔布及家人（包括托克维尔父母）被公安委员会批捕入狱，他与一个妹妹、一对女儿女婿及一双孙女孙女婿死在了断头台上。可以说，家族曾经的磨难使托克维尔虽未亲身经历法国大革命，但却清楚地感受到其政治后果。^②托克维尔对曾外祖父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人们不会忘记马尔泽尔布先生曾在路易十六面前为人民而辩护；也曾在国民公会面前为路易十六而辩护。这是一个我从未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双重典范。”^③

1820年，托克维尔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应时任摩泽尔郡郡守的父亲要求，托克维尔来到梅斯并进入皇家学院学习，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并结识了两位好朋友：克尔戈利（Louis de Kergorlay）和斯托弗尔斯（Eugene Stoffels）。^④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家庭以外的广阔的世界，经历了一次不无痛苦的精神上的转变，得自于贵族家庭的正统保皇主义以及富于冉森派色彩的天主教

在1793年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进行审判，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时候，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挺身而出担任了路易十六的辩护人。他说：“以前当人人企求这种职位的时候，我曾两次被召为我的主人做辩护人，现在，当很多人认为这个差事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仍然应该同样为他效劳。”米涅著，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72页。

^② Cheryl B. Welch, *De Tocquevil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8.

^③ Françoise Melonio's "Tocqueville: aux Origins de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 from François Furet & Mona Ozouf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Pergamon Press, 1989.

克尔戈利是托克维尔才华横溢的表兄，在思想和生活上对托克维尔影响都很大，晚年的托克维尔曾为这个他所遇见的最优秀的头脑之一没能完成一些杰作而深感惋惜；而斯托弗尔斯则来自一个平凡的市民家庭，他不够优雅但很机智，他的宽厚和忠诚使他与托克维尔结成了一生的朋友。

信仰都产生了严重的动摇。

父亲在梅斯的藏书对托克维尔的影响远远大于老师的教诲和学校对他的影响。在那之前他玩得多学得少，从来没有质疑过童年时期获得的信念。突然一下没有了家庭的束缚，他第一次得以在观念世界里自由探索。在这一时期，托克维尔接触到了大量 17 世纪经典作家以及翻译的古典作家的著作，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布丰 (Buffon)、卢梭、以及马布利 (abbe Mably) 和雷纳尔 (abbe Raynal) 两位神父等人的著作。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他敏感到自己的思想世界的摇摇欲坠：他开始意识到家族里所认可的价值已为他所处的时代抛弃，固守贵族时代的理想已不合时宜；贵族时代已一去不返，法国正处于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从那时起，托克维尔丧失了思想上的安宁和笃定。作为一个从未并永远也不会生活在贵族政治体制下的贵族，托克维尔以后的一生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贵族与一种新兴的民主之间相互适应的不无痛苦的过程，既是对本阶级的继承和决裂的一生，也是捍卫贵族美德以及与贵族偏好（有时纯粹是本能）^① 作斗争的一生。

三十五年以后 托克维尔在回顾这一发生在他青年时代对他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的事件时仍记忆犹新：“在童年刚过的几年里，我处于孤独之中，我产生了一种只有大量的藏书才能予以平息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我不加选择地往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它们对更加成熟的人更为合适。直到那时，我在一种还未曾让怀疑渗入到精神里的信念中过活。然后怀疑开始了，或者不如说怀疑以难以置信的迅猛闯了进来；不仅仅是单质质疑这或那，而是全面地质疑。突然，我感受到了经历过地震的人们的感觉：大地在脚

比如，在美国人以极大的热情拓殖开荒的时候，托克维尔却在日记里感叹：“我，一个并不分享美国人对麦田的热望的人，为那些漂亮的树被砍掉而深感遗憾。在人类还没有破坏它们之前，这些森林该是多么美丽啊！现在它们就像被剪去秀发的漂亮女人。”

see George Wilson Pierson, *Tocqueville i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4.

下摇晃，周围的墙壁、头上的屋顶、家具以及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最深沉的忧伤向我袭来，然后是一种对生活的极度厌恶，虽然我对生活还一无所知；看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将要走的路，不安和恐怖几乎使我匍匐在地。……（后来）我在青年时代的早期所经历的这些感情（那时我只有十六岁）仍时不时地攫住我。然后我再次看到观念世界在旋转而我迷失在全面的震荡之中——这个震荡颠覆和动摇了为我的信仰和行动奠定基础的所有的真理。’^①

从 1823 年到 1826 年，托克维尔顺从家庭的愿望，返回巴黎学习法律。在完成学业以后，托克维尔与哥哥爱德华（Edouard）一起游历了意大利。意大利之行中，托克维尔厌恶专制、热爱自由的真实个性开始呈现。在西西里与一位那不勒斯人作了一番谈话以后，托克维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欧洲及其所享有的自由，将不能忍受这个专制的角落——这个角落因其特殊的性质肯定是不稳固的。

在父亲的努力下，托克维尔于 1827 年 4 月 6 日被任命为凡尔赛的不支薪的调解法官。这是一个专门为他而设的职位。皇家总法官在致司法部长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在凡尔赛法庭增设第四个调解法官职位将会有极大的好处，并企盼阁下能批准这个建议——我相信这与服务（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我荣幸地向您推荐查尔斯—亚历克斯·克勒里尔·德·托克维尔先生，一位年轻的律师，塞纳—瓦兹郡郡守的公子，他热切地希望得到这个任命。小托克维尔先生的学业十分出色。他充满热情，在我而言，我极愿为其父亲在这件事上效劳——这在凡尔赛的政府和司法系统之间将产生一种切实的联系，在许多方面都有利。”^③

虽然托克维尔遵从家庭的意志学习了法律，但对家里为他选择的职业感到极不适应。作为一个不善言辞、不善交际的人，托克维尔

致斯韦琴夫人(Mme Swetchine), 1857 年 2 月 26 日。Andre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Inc., 1988, p. 61.

② *ibid.*, p. 71.

③ *ibid.*, p. 73.

在这个职位上既未培养起热情，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的最大收获是结交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后者出生于都林最上流的富有贵族家庭之一（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拉法耶特 Marquis de Lafayette 的外孙女婿）同样对正统王朝忠贞不二 同样对思想问题兴趣浓厚。但两人的个性截然不同 博蒙优雅、热情而体贴 托克维尔则敏感、矜持而沉默 不过博蒙却赢得了托克维尔轻易不愿予人的信任 两人的感情因而日渐深厚。就像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所说“，他们尽可能地相互补充，一个是严肃的思考者，一个充满了抚慰人的感情 就像醋罐子和油罐子一样”。^① 在他们的友谊中，博蒙充当了托克维尔与外界的中间人，托克维尔自我怀疑的抵制者和安慰者。在后来的生涯中 他们既是工作（凡尔赛法庭及议会）中的同事、互相激励的学友 又是旅行（美国之行及随后的英国、爱尔兰之行）中的伙伴、合作者（《美国监狱制度改革及其在法国的运用》）的作者。虽然在七月王朝末期关系有所冷淡，但仍不失为一辈子的知己。

二、时代的洗礼

对近代法国而言 法国大革命既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 也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开始，结束得既非心甘情愿，开始得更非一帆风顺。大革命以后，旷日持久的动乱和革命使法国政治呈现出一派混乱景象。理论上，以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等人为代表的权

^① See Jean-Claude Lamberti, *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4, n.

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强烈抨击伏尔泰和卢梭，反对大革命，主张全面恢复波旁王朝和教会对法国的统治。他认为，社会是生就的而非造就的，它先于且高于个人。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必然会走进社会，他的意志与社会或政府的建立无关。作为事实，社会或政府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或正义不正义。政府从其本质上讲是绝对而无限的。人们的行为出于感情、成见而非理性或意志，教会具有无上的神圣权威。他的思想对法国天主教教皇主义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巴朗什（Ballanche）批评他除了过去世纪的声音什么也没能听到。是一个错把回忆当作展望的过时的预言家。 see Roger Henry Soltau,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ell & Russell, Inc. 1959, pp. 16-23.

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形形色色的保皇主义(Loyalism)^①、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②(最著名的当数空论派 Doctrinaires^③)互竞高下。在这些派别之中,权威主义很难说有追随者或有多大影响,而极端保皇派实际上没有理论,不过是流亡者和革命前教会利益的代表。自由主义派别在经历了罗伯斯比尔(M. Robespierre)和拿破仑的两次打击之后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从革命的危机中复苏之后,他们感到有必要巩固自己的成果而不是追求新的征服。不过,在1815年以前,他们从来未曾真正实际参与政治,结果“活着时被大量谈论、死后只留下一段空白的记忆”。^④此后,自由主义派别开始在政治领域展开活动:1814—1820年他们试图围绕1814宪章(*La Charte de 1814*)建立一个能稳定新制度的政党,从1820—1830年他们为争取最高权力而成为极端保皇派的反对派,七月革命使他们首次掌权却使法国政治陷入固步自封。结果,权威主义者试图倒拨时钟,而1830年后的自由主义派却想使时间停滞。

法国的保皇主义前后共出现了三派:正统派,只认波旁家族;波拿巴派(Bonapartists),支持拿破仑家族;奥尔良派(Orleanists),忠诚于奥尔良家族。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建立以后,保皇主义才慢慢趋于平静。

②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称呼,包罗从立宪主义到共和派等等派别,十分松散。与保守主义一样,它反对抽象的教条、信仰或先验的理论,要求维持社会秩序、把权力限制在特定阶级手中,视选举权为工具而非权利,反对选举权的普遍扩大。自由主义的信仰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对作为权威的界定和限制的法律的信仰,对制度的价值的信仰。see Roger Henry Soltau,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ell & Russell, Inc., 1959, pp. 32-61.

这个称呼的本意是泛指将自己的哲学观点不顾实际地运用于政治或其他事务的人。在法国历史上,雾月政变后的保民院中,即有一批因放言高论而为拿破仑所厌恶的“空论家”。一般指的是1817年议会开会期间由知名人士鲁瓦耶·科拉尔(Royer-Collard)、巴朗特(Barante)、雷缪扎(Remusat)等结成的君主立宪派政治集团。主要代表人物还包括塞尔(Sevre)、基佐(F. Guizot)等等。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温和派的自发组合。他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支持复辟、拥护正统、实施立宪制的君主,既反对君权神授学说与君主专制,也抵制任何民主的、激进的运动。基佐作为七月王朝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执政以后偏于保守。

④ Roger Henry Soltau,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ell & Russell, Inc., 1959, p. 11.

ibid., p. 36. 基佐堪称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派别随着由反对派变为执政派别以后立场变化的典型代表。

从实践上讲 与英美等国相比 有‘宪法的试验场’之称的近代法国的政治呈现出一波三折的轨迹。大革命以后，旧制度坍塌所激起的尘埃以及大革命的硝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旧制度不复存在 而新制度尚未完全确立 过渡时期的人们陷于病急乱投医的境地 而挫折又常常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因此拿破仑以后的法国政坛仍旧继续在摸索：“人们对责任政府毫无经验：它的法律、要素、危险、原理、保证。人人都更加盲目地冲向这个一无所知的境地。还没有摆脱专制主义，他们全都一头栽进一种最为困难的政府形式——它需要最大的智慧、机敏、审慎、节制的力量和明智的妥协；人人任凭激情的牵引往前冲 对一切都不满意 对什么都想要。”^①

第一帝国崩溃后 在正统主义原则下 波旁王朝恢复了对法国的统治。它是盟国的意志而非法国人的自由选择 人们[除少数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像不得不接受天气一样无可奈何。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路易十八、查理十世的复辟王朝（1815—1830年）是一个白旗君主立宪政权。路易十八在 1814 年颁布了宪章，但这个宪章既未经议会通过，也未经公民投票批准，而是由国王赐予的。其开头是：“鉴于法国之所有权威系于国王一人者……朕以自由意志 以王权之自由行使 兹承认此宪法之宪章。”^②落款为“钦赐于巴黎 基督降生第 1814 年 我朝第 19 年”。^③ 1824 年继位的查理十世态度强硬 他在极端保皇派的鼓唆之下 试图全面地恢复旧制度。他顽固地表示：“我宁可去锯木头，也不愿按英王那种方式进行统治。”^④ 1828 年 1 月—1829 年 8 月 马蒂涅克 Martignac 首相有限的分权改革 也以失败告终。在与议会愈演愈烈的斗争中，查理十世的顽固和愚

^① Roger Henry Soltau,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ell & Russell, Inc. 1959, p. 7.

^② G·de·拉吉罗著 杨军译：《欧洲自由主义史》[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50 页。

洪波著：《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81 页。

同上书，第 82 页。

^⑤ 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主要市政官员改由选举而非王朝政府任命产生。